

炼狱中的圣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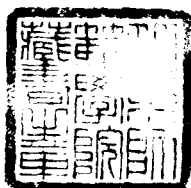
王 西 彦



1206-2/45

炼狱中的圣火

王 西 彦



20875729

875729

炼狱中的圣火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96,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8\frac{13}{16}$ 插 页 3

1982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0,000

书 号 10019·3371 定 价 0.80 元

自序

今年上海的夏天虽然来得比较迟缓，立夏过后半个多月了，身上还穿着毛线上衣，但窗外园子里毕竟已是一片葱绿，银杏树和悬铃木的枝叶密密层层，夹竹桃和火石榴都怒放着红艳艳的花蕊，在阳光下焕发出一派初夏季节所特有的生气。这些年来，我对季节的变换特别敏感。枯枝上的一片嫩叶，墙脚边的一丛稚草，都会拨动我过敏的神经，使我陷入一种噩梦乍醒时的恍惚状态。我知道，这只是由于自己感情过分脆弱，时间的流逝竟未能冲淡过去那一长串梦魇似的经历。

在曾经出现于我们国土上的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一个时期，我先被“造反派”关在一处大“牛棚”里。这是一幢充当书库的小楼，由于年久失修，早已被判定为“危险房屋”，如今被选作关押“牛鬼”的场所，两间原是阅览室的前楼，拥挤着二、三十名“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算我幸运，占有了靠南窗走廊里的一个位子，刚好面对窗外花园里的一架葡萄藤。我刚被关入“牛棚”时，正是初夏季节，葡萄藤非常茂密，叶片重重叠叠，微向上翘的卷须几乎要探入窗口。很快地，淡白色的花朵开放了，浅绿色的果实结成了，整个葡萄藤架仿佛不堪累累果实的重荷，慢慢地往下沉落。很快地，果实被采摘光了，叶片发黄了，飘落了；最后终至剩下一些稀疏的枯藤。但是，就从那些稀疏的枯藤上，又吐露出嫩芽来了，长成重重叠叠的茂叶了，开花了，结果了。望

着窗外的葡萄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道：“又是一年了！”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无休止的磨难中消逝了，那架凋而复苏的葡萄藤就是忠实的见证者。后来，据说是因为“罪行”升了级，我又被移到机关大楼后面一处小“牛棚”里。这是一间窄狭的煤气间，一排四个废弃了的煤气灶几乎占去了一半面积，剩下的有限空隙地带拥挤着我们六名情节严重的老“牛鬼”。从早到晚，我们就这么膝盖碰膝盖地坐在一张狭小的桌子——它是给我们写交代和“思想汇报”用的——旁边认罪思过。比起书库楼上的走廊，我们的处境要坏得多了，还得随时准备着被成群结队前来串连的“革命小将”们揪出去批斗。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仍然有着自己的幸运。原来这间煤气间有个朝西的小窗子，窗外竟然有棵紫荆树，早春季节，叶子还没有吐芽，枝梢却已经绽出成簇的紫花。不用说，这种给人们带来春讯的花簇，很快就凋谢了，飘落了，结出了长而扁的荚果。和坐在书库楼上走廊里的时候一样，我每年望着窗外的紫荆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消逝，消逝……

事过境迁，现在纵然已经很难描述当时的复杂心情，但那架葡萄藤和那棵紫荆树却将长存在我的记忆里，直至生命的最后。它们将成为永恒的见证者——证明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个怎样的时代，遭遇过一场怎样的悲剧，而且充当过那悲剧中的一名小小的角色，一名不幸的受难者。

对季节的敏感，自然只是由于无情岁月的流逝，使你痛惜自己生命可悲的浪费。保留在记忆深处的书库小楼前的葡萄藤和煤气间窗外的紫荆树，也只不过是无知的证物。我所要说的，当然不只是这些。前面我不是提到挤坐在煤气间里的六名情节严

重的老“牛鬼”吗？在他们中间，有的是刚刚担任了一个国际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副团长，他从很年青的时候起，写下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和散文作品，深受读者爱戴，享有国际声誉，而且为国宣劳，刚刚在上海送别了一批外国作家，身上还留有飞机场上的灰尘，手上也还留有和外国朋友握手道别的余温；有的年逾六旬，满头白发，早年参加过“左联”，在革命文学队伍里坚持了半个世纪，他的作品曾受到鲁迅的赞扬，建国以后在文学刊物的编辑室和大学的教室里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业余作者和青年学生的教育培养上。其他几名老“牛鬼”，自然也莫不是革命文学队伍中的老战士，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为文学事业尽了力量，给人民作了贡献。可是，如今他们却在一阵天昏地暗的旋风中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人类以外的“牛鬼”，别人有权利处罚他们干脏活苦活，给他们戴高帽子，画鬼脸，剃阴阳头，强迫他们站队背诵《敦促×××投降书》，扭他们胳膊做“喷气式”，押他们游街示众，关他们隔离室，下他们监牢，逼他们跳楼或上吊，以至于把他们拷打致死。面对着无休止的虐待和无穷尽的屈辱，你竟完全不明所以，既无法申辩，也无力反抗，而且这一切还都是发生在革命的名义和光天化日之下的，请想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更荒唐、更不堪、更折磨人类良知和嘲弄历史正义的事情吗？我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明世界，未曾经受过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酷刑。但据说那是天主教会用来镇压“异端”和“异端嫌疑者”的。看起来，我们已经被认为是革命的“异端”和“异端嫌疑者”，我们的世界也已经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了。情形既然是这样，如果你未能结束自己“罪大恶极”的生命，就只有在在中世纪式的虐待和屈辱中苟活下去。

不错，我们的确是苟活下来了。我说“我们”，其实是不精确

的，因为我们中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超人的忍受力，有这种苟活下来的机缘。我们被关进小“牛棚”以前，就有人用开煤气灶和跳楼之类的办法来使自己脱离苦难；我们被放出小“牛棚”以后，也还有人在被专政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这本回忆文集里的《向死者告慰》一篇，就是记这位死者在永离人世以前一段时间里所遭受的待遇，所忍受的煎熬的。这位死者，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满头白发的老“牛鬼”，他永离人世时已年逾七旬。在活下来的幸运者里，我也写了一篇《炼狱中的圣火》，读者当然一读就会明白，我记的是那位从送别外宾的飞机场直接走进“牛棚”的著名老作家。

不用说，我把这个集子定名为《炼狱中的圣火》，并不只是因为里面收容有这篇回忆文章，还有着我自己的寓意。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时，不是把过去曾经在作品里描写过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也“上纲”为“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的“滔天大罪”吗？人们只要有耐心去查一查当时“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看一看接受他们豢养和指使的“东门学士”们连篇累牍的皇皇大文，就会知道他们的是有着“横扫”一切知识分子的气概和决心的。既然“知识愈多愈反动”，既然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既不会种田，也不会做工”的剥削者和精神贵族，如果不把他们“横扫”得一干二净，以驱使人类回复到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怎么能“进行到底”呢？不言而喻，在这样的“革命风暴”里，我们这些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且又曾经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的人，自然是罪不容诛了。

但是，按照但丁在《神曲》里的描写，罪人在地狱里经受了苦

难，却能升入炼狱，由天使在他额上拭去罪恶，使他们的灵魂返璞归真，完全无罪。我愿意承认，我的确是把自己所属的全体正直的知识分子都看成经受了苦难和考验，证明是完全无罪的灵魂的。就我所身经目睹的范围来说，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很沉重，经历的考验也很严峻。从我稍稍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我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有革命家，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作家、演员，也有地位低微的小职员。我不敢说自己怎样了解他们，但至少可以说我相当熟悉他们。我知道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热爱祖国和人民，愿意尽自己的所能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的。他们都在寻找那条自我贡献的途径，在造福人类的业绩里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知道，即使在过去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他们就那样做了，从他们身上发出的光和热，就温暖过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燃烧过当时千万人的心灵。他们中间的先驱者，已经成为后继者前进的火炬，历史上将永远用热情的字句记载他们的业绩。回顾过去那个时代的遭遇时，人们每多采用“饱经忧患”这个词儿。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儿，也许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懂得它的含义吧？

但问题不只在回顾过去那个黑暗时代的回顾，而在于历史的不公允，在于这群饱经忧患的不幸者竟然受到了历史不公允的待遇。而且，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悲剧和它的众多的受难者，竟是在一个据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里，不是更令人颤栗吗？读者当不难看出，收容在这集子里的几篇对难友们的回忆文章，绝不只是为了纪念受难者而已。

在一个散文选集的自序里，我曾经说到这些回忆文章，说到

有一个时期，每隔几天，就要去一次火葬场，参加给一些在“十年动乱”中含冤倒下的朋友们平冤昭雪的仪式：“当我肃立在送葬的行列里向死者默默致哀时，听着死者家属们的哭泣，我感到自己的心灵也在哭泣”。即使时间又过去了几年，就在此刻写这篇自序时，我依然感到自己的心灵还在颤抖。出现在我眼前的，并不只是那些含冤倒下的死者和那些饱经摧残仍然活着的朋友们的面容，而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身影。我记下他们中间少数几位自己所熟悉、所尊敬的，看起来好象我只在写个人，写自己；实际上我是在写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写他们所曾经遭受的不公允待遇。

因此，我觉得还应该说一说自己在写作这些回忆文章时的情形。“四人帮”刚被粉碎时，我好象一个久处暗室的囚徒，一下子颇不习惯于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过了些日子，我开始环顾自己的周围，想起了一些命运大致相同的朋友。正在这时，陆续传来他们中间有的已经永离人世的消息。我觉得自己有写一写他们的迫切愿望。经历了几个不眠之夜，《向死者告慰》就是第一篇。正如一位朋友所记述的，写成后，我只想给几个熟人看看，并没有想到可以公开发表，所以直到近两年后才刊登在一个资料性期刊上。没有想到，我竟然接到很多封朋友和读者的来信，有的信里还说到它怎样使写信人“涕泪交加”。有些朋友更在信里和当面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因此，接着我不仅写了《辛勤的播种者》、《种子落到了泥土里》、《坠落的鹰》和《怀谢德》等纪念在“十年动乱”中的牺牲者的文章，还写了《从学者到战士》、《回忆统照先生》、《在魑魅的追逐下》、《我所认识的黎烈文》等追怀早已故世的师友们的文章。每写完一篇，我就感到自己心头的重压略轻一分，仿佛还掉一笔精神上的债务。也就是在

这样的时候，我才似乎读懂了鲁迅那首悼念亡友的诗篇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名句。我回想起自己还戴着个“牛鬼”的帽子时，总是低着头走路，害怕在街上碰见什么熟人。偶而不小心，发现前面有个人突然横过马路去，忍不住抬眼望他一下，认出原来是个处境远比我好的熟人，心里充满感激，觉得对方总算机警而知趣，避免了一个打照面的尴尬场面。但也有完全不同的情况。例如有一天，我低着头刚从一处警岗后面转过弯，突然有一只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使我吃惊到身子一震，却发现原来是过去我所住弄堂口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同志，他小声地鼓励我道：“要保重！要好好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说着，他伸过手来重重地握了我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怔怔地望着他迅速远去的背影，顿时喉咙哽咽，眼眶里涌满泪水，虽然类似的遭遇并不止这一次。“活下去就是胜利！”是呵，只要有一丝可能，为什么要不活下去呢？常言说得好：“受过的苦，流过的水。”一个人绝不能脆弱到使自己一下子就被痛苦噎死。就是我在《向死者告慰》里面所记念的那位“牛棚”里的难友，在彼此最难熬受的时刻里，曾经用这样的话来互相勉励：“你不要看现在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可总有一天，它仍然会从东边出来！”即使他自己并没有活到太阳从东边出来的一天，但他的信念却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在写下了几篇怀念死者的回忆文章后，我又起意写一写两位饱经摧残却依然活着的朋友，就是《炼狱中的圣火》和《面临撒旦的挑战》。在写这两篇回忆文章时，当然有惋惜，有痛苦，有压抑的情绪；但也有安慰，有鼓舞，有胜利的欣喜。

那么，是不是也有启发和教育呢？这个集子里的回忆文章所怀念的师友，记述在《从学者到战士》一文中的吴承仕先生是

远在几十年前就永离人世的。他走的那条从学者到战士的道路，就是一个极其动人的楷范。特别富于启示的是，他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却和老师刚好走了相反的方向。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鲁迅，晚年为文回忆太炎先生，曾对有人因看到上海的官绅们为章太炎开追悼会时的冷落情景而慨叹于“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一事表异议，认为这是由于“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的缘故。也就是说，章太炎走的是一条从革命家倒退到“宁静的学者”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承仕先生的榜样就特别值得后世崇敬了。不是到了四十年代末那个风云激荡的时刻里，也有一位走着从学者到战士的道路的诗人闻一多吗？我以为，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用血和生命铸造而成的好传统。我的起意写《辛勤的播种者》，写那位曾经皈依佛教的漫画家后来竟然成为有些人眼睛里的叛逆者，也就是为这个传统摆出例证。其实，何止是那位漫画家？所有未能逃避“史无前例”的十年劫难的死者和生者，哪一个不是这样的例证，不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值得自豪的脊梁？

读者对收容在这个集子里的回忆文章的鼓励，自然使我很感激；我所写到的那些朋友们的亲属的反应，尤其使我感动不置。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写《向死者告慰》时的心情。在魏金枝同志生命的最后阶段，恐怕我是他最为接近的一个朋友了，这自然是因为彼此的遭遇过分相似，而机缘又作了这样的安排的缘故。当他默默地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我赶到他的家里和他的遗孀

和女儿一起痛哭时，我觉得死去的不仅是自己的朋友和兄长，甚至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向死者告慰》也不只是为死者而写，同时也是为自己已经丧失的那部分生命而写。我的确是蘸着自己的眼泪写下这篇文章的。但我的起意写《辛勤的播种者》，却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丰子恺先生一直遭受某些人的误解。我认为他走过来的是一条近代知识分子颇为独特的道路，对后人特具教训和启示。当我把自己的立意告诉了他的女儿一吟同志时，她不仅给我送来了大批有关的资料，包括有些不易搜求的画册和土纸本文集，还和我多次长谈，又从外地约来一位她父亲生前比较接近的学生，大大增进了自己对这位竭一生之力从事启蒙工作，曾经对中国新文化起过重大影响的漫画家的理解。《辛勤的播种者》在刊物上发表出来以后，子恺先生的另一位女儿，一吟同志的二姊宛音同志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说她“一面读着，一面流泪”，“至今内心一直难以平静，难以忘怀”，并在详述了父亲谨慎勤勉的一生经历后，写到了他最后含恨而死的景象：

“记得他在弥留之际，始终是‘一目未瞑，四肢犹温’。当父亲奄奄一息时，我们围绕在他床前，泣讯有何遗言。可是，父亲只微微摇摇头，轻轻地吐出了‘没有话可讲’五个字，同时一行泪水从眼角直流下来，就此停止了呼吸，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可怜他生前受尽不白之冤和无情的斗争，到临终时仍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父亲临终时那种怨愤的神情，我将终身难忘！”

我以为，她在信里所说的她父亲“到临终时仍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的景象，的确反映出了我们这一代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我还愿意在这里说一说《种子落到了泥土里》发表以后，我

收到了死者女儿邵小琴同志的一封信。小琴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题为《愿它永远成过去》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我不能哭，我又不能不哭”。接着记叙了“文化革命”开始后双亲的遭遇，记叙了“一九二六年入党，为革命坐过牢，吐过血”的父亲怎样惨死在监狱里，“棉被上，裤子上都是粪便”；原是“精力充沛，永不知疲劳”的母亲怎样被折磨得“头发全白了，瘦得身形都变了”，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而且“已经偏瘫失语了”。我是先读了她这篇血泪文章，然后才写自己的回忆的。小琴同志读了我的回忆，在给的信里写了一些显然是克制自己激情的语句后，忽然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您能告诉我，究竟我的生日是哪一年吗？过去妈妈曾说是一九四〇年，您的文章里写的却是一九四一年，究竟哪一个说法是确实的呢？”读到这里，我眼前立刻浮现起“皖南事变”后遭受敌人追捕的荃麟夫妇匆匆逃避到福建一个小小山城里，随后又隐伏在一处荒凉的山间小屋里的场景。小琴同志就是在当年秋天出生在那间小屋里的。可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在父亲被迫害致死和母亲被迫害致残之后，竟弄到连自己的生辰年份也弄不清楚了，这是怎样的悲剧！的确，我也为此立刻陷入一种“我不能哭，我又不能不哭”的窘境，久久不能自制。

看起来，我们常言所说的“死者活在后人们心里”这句话，的确是极为真实的。

在《炼狱中的圣火》的后面，我加了两篇短短的附录，就是巴金同志的《写真话》和《说梦》。我这样做，自然是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字数虽不多，却披露出作者当时真切的思想；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这位深受读者爱戴的作家有着怎样纯良的品质和开阔的

胸襟。十年动乱的一个严重恶果，就是以最堂皇的名义，最革命的辞藻，颠倒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摧毁人们对美与善的信念。我们这些被推入地狱经历劫难的人，曾经有过怎样的迷惑、痛苦和忍受。事实上，我的确看到有人缺乏起码的诚实，不惜歪曲事实，编造神话，把自己描绘成受屈的英雄，抗暴的豪杰。而巴金同志却在《写真话》和《说梦》里作了怎样诚挚的自我解剖！我觉得，这决不只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态度问题，更是一个正直的作家的道德力量的表现！

我已经在《炼狱中的圣火》里说到了，这个集子是在巴金同志不断的鼓励下写成的，所写的又大都是彼此共同的朋友，那么，就让它作为我们长期同蹲“牛棚”和农村“劳动营”的纪念吧。我相信，只要人类的良知尚存，理性不泯，我们曾经经历过来的那一幕“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永远绝迹，永远不再重演。

王 西 彦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



巴金和作者合照（一九八一年上海）



张天翼和作者合照（一九七九年北京）

《张天翼——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

张天翼（1899—1984）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目 录

自 序	1
-----------	---

炼狱中的圣火	1
--------------	---

附录

写真话(巴金)	29
说 梦(巴金)	31
面临撒旦的挑战	34

向死者告慰	67
-------------	----

辛勤的播种者	88
--------------	----

种子落到了泥土里	116
----------------	-----

坠落的鹰	135
------------	-----

怀谢德	152
-----------	-----

高大的拱桥	166
-------------	-----

从学者到战士	174
--------------	-----

回忆统照先生	198
--------------	-----

在魑魅的追逐下	213
---------------	-----

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239
----------------	-----